

# 「馬賽克家庭主義」

## ——從女兒養老看中國家庭制度變遷

• 計迎春

**摘要：**在中國轉型社會中，傳統與現代雜糅並存，傳統父權、父系家庭體系逐漸出現了鬆動和新的變遷趨勢。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本文以「馬賽克家庭主義」理論為指導，對中國長三角地區一個城鄉一體化的縣級市中二十一名不同世代的女性，關於養老和代際關係方面的問題進行了半結構性訪談。具體的發現如下：一、父母和成年子女相互依賴，親密共生；二、這種代際親密關係體現了金錢、情感和實踐等多種元素的交織；三、父系家庭規範弱化，母系家庭實踐強化，出現了「雙系多核」家庭模式；四、在現代性別規範愈益鞏固的同時，傳統父權規範也得以微妙地重寫甚至強化。在經驗發現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發展了「馬賽克家庭主義」理論，強調在代際親密共生的雙系家庭模式產生的過程中，傳統和現代規範，金錢、情感和實踐，如何雜糅並存，書寫中國家庭再制度化過程。

**關鍵詞：**馬賽克家庭主義 女兒養老 家庭再制度化 代際親密共生 雙系多核家庭

### 一 前言

1980年代開始，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四十年以來，中國的經濟飛速發展，在現代化的道路上一路高歌猛進，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近年來，在經濟由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出現的同時，人

\*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為上海大學社會學院許若男於2018至2019年間在長三角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城市收集的關於女兒養老研究的半結構性訪談和參與式觀察。在此向我的學生許若男表示最誠摯的感謝。本研究得到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15AZD080)和上海市教委東方學者特聘教授項目(No TP2015032)的資助。筆者誠摯地感謝馬里蘭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在研究期間給予的幫助。感謝范芝芬、鄭真真、陳緋念教授的建議和幫助，感謝閻淑、林志勇、楊雙雙博士的建議，特別感謝我的學生劉岳、王會光博士等的編輯幫助。

口轉型卻進入低生育率、快速老齡化的另一種新常態。人口作為經濟增長發動機的紅利日漸減退，家庭日漸成為人口問題、經濟問題和社會分層的節點所在<sup>①</sup>。一方面，現代化的影子在個體家庭層面得到彰顯，特別在城市中，初婚年齡後延，同居行為增加，年輕一代對於婚前性行為日益寬容，離婚率上升，家庭核心化的態勢穩定，作為家庭關係橫軸的夫妻關係的主體地位穩固<sup>②</sup>。另一方面，中國長期處於少子化狀態，總和生育率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低於更替水平，即使自2013年起國家兩次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從單獨二孩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也未能改變低生育率的頹勢<sup>③</sup>。而上述年輕世代追求自我、突顯個性的行為也更為多元化並更為社會所包容<sup>④</sup>。這一切和西方的現代化、人口轉型和家庭變遷理論，以及關於現代性、個體化和發展理想主義的探討似乎不謀而合<sup>⑤</sup>。

然而，在當代中國社會中，婚姻締結依然普遍，並相對流行早婚，這既和西方國家相異，也和她晚婚、不婚的東亞姐妹社會非常不一致<sup>⑥</sup>。中國大中城市的諸多公園在周末時分總有一角擠滿了憂心忡忡為兒女徵婚的父母，而被安排相親的兒女則從「70後」為主轉變到「80後」為主，還包括愈來愈多的「90後」。與此同時，兩代以上同居的主幹家庭一直保持可觀而穩定的比例，甚至近年來還有所上升，代際團結呈現高度的韌性，而祖父母的育兒照料也是家庭存續的重要支撐<sup>⑦</sup>。如果再加上不同住，包括「一碗湯」距離的父母和成年子女，這個比例還會大大增加<sup>⑧</sup>。家庭的緊密性、親密性和家庭成員包括代際之間的相互依賴似乎有所強化，而圍繞養老、育兒、照料等需要形成的代際居住安排也因時空因素而更加多元化<sup>⑨</sup>。儒家父權思想、傳統家庭價值觀和性別觀念，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進程中也有所抬頭<sup>⑩</sup>。這一切似乎又和上述的現代化及相關理論背道而馳。

事變時移，中國傳統家庭模式的敘事如「反饋式」、「祖蔭下的延續香火」、「金翼下的傳統父權家長」等，已經不能全面反映現代化進程下家庭模式的複雜紋理，以及其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令人困惑的「錯位感」與「違和感」<sup>⑪</sup>。在諸多講述改革開放以來家庭變遷的研究中，出現了許多富有啟發性的視角和概念，如「個體化」、「下行式家庭主義」、「恩向下流」、「互惠式」、「失衡的代際關係」、「結構和個人互動中的多元居住模式」、「社會和時空流動中的家庭」、「新家庭主義」，等等<sup>⑫</sup>。

上述私人家庭領域中所體現出來的傳統與現代的張力以及不同的解釋路徑，恰恰折射了中國轉型進程中的一種複雜現代性（或者說雜糅現代性）<sup>⑬</sup>和理解這種現代性帶來的挑戰。這種複雜現代性和中外學者對現代性的反思，如「第一現代性」、「第二現代性」、「風險社會」、「不完全個體化」、「壓縮現代性」等概念具有很大的相關性，也有一定的拓展<sup>⑭</sup>。正是以中國轉型社會的複雜現代性和性別動態變遷<sup>⑮</sup>為背景，筆者在2017年提出「馬賽克家庭主義」的本土化理論<sup>⑯</sup>，探討當代中國家庭關係的再制度化——呈現一種傳統與現代並存、代際共生狀態突出、注重家庭兼強調個體訴求、金錢和情感密不可分、性別維度明顯的「馬賽克」雜糅性。

本研究以「馬賽克家庭主義」理論為框架，通過深度訪談和參與式觀察，調查中國長三角地區H城的二十一名女性的養老實踐，來深入理解當代中國

社會正在發生的家庭代際關係和家庭制度的變遷。我們共有四個主要發現：一、代際親密共生模式的興起；二、這種親密關係呈現出金錢、情感和實踐的雜糅式交織；三、父系母系並重，夫妻和雙方父母緊密聯繫互動的「雙系多核」家庭模式的出現；四、現代性別實踐和傳統父權規範之間的矛盾和滲透。本文通過聚焦代際親密共生的雙系家庭模式的出現，提出中國家庭正在進行再制度化過程，並深刻揭示再制度化的各種機制，進一步豐富、深化和拓展了「馬賽克家庭主義」理論。

本文的核心貢獻有兩點：一是深化和豐富關於現代性和現代化的探討，特別是在非西方情境下的探討，挑戰相對西方中心主義、男性中心主義，以及二元和線性的現代性的話語體系；二是以「馬賽克家庭主義」理論為框架，對轉型期中國家庭關係的再制度化進行理論提煉，指出中國家庭關係呈現出一種全新的代際親密共生、雙系多核家庭模式。

## 二 「馬賽克家庭主義」

在中國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單位制式微，公私領域日漸分離，終身僱傭制成為歷史。在經濟和實踐層面上，個體家庭必須承擔曾經由單位分擔、提供而後被「鬆綁」、「減負」出來的社會再生產和照料方面的服務；在情感層面上，集體歸屬感剝落；在規範和精神層面上，社會失範頻現，「熟人社會」衰敗，傳統思潮有所回歸。由於缺少健全的社會福利體制，面對市場的不確定性和原有生活共同體（集體）的瓦解，家庭成為了其成員經濟上的安全網、情感上的港灣和精神上的堡壘。特別是面臨房價高漲、醫療和教育產業化、養老託幼育兒市場化、勞動力市場激烈競爭和生活費用日益高昂，個人必須依賴家庭、保護家庭，而家庭也成為代際/不同成員之間金錢、情感、精神、責任、期待交匯的要地；衝突、逃避、協商、合作存在於不同家庭中，也存在於同一家庭中。新的家庭模式、關係和規範也在探索和形成之中。

在長期的計劃生育政策和低生育率的情境下，父母不遺餘力地投資在子女身上。「科學母職」、「密集母職」和「教育媽媽」在城市中產階級中日益盛行，「全職媽媽」和「陪讀媽媽」也司空見慣<sup>①</sup>。在城鄉各地，父母資助子女購房或者直接為子女購建私房已經成為很多年輕人結婚的標配<sup>②</sup>。這些慷慨的投入和高強度的互動強化了父母—子女之間的紐帶，加深了他們在經濟、家務、情感、責任上的相互依賴，但也有可能激化雙方的矛盾。

在上述背景下，父母—子女之間呈現一種相互依賴的代際共生模式。這種共生關係，既可能發生在同一地點，也可能突破空間範圍，比如他們可能住在一個屋檐下，也可能住在不同小區、省份甚至國家；既可能呈現共時性，也可能以不同形式發生在生命歷程的不同階段，比如父母對子女的投入和照顧可能從他們未成年延續到成年、結婚、生子；子女可能在結婚時搬離父母的住處開始獨立生活，父母也可能在子女生育後搬進子女的住處幫助照料幼兒。這種在生命歷程不同階段中因時因地制宜的居住安排和互動模式，

也會對代際、夫妻關係和家庭生活產生複雜的影響<sup>19</sup>。父母對成年子女的持續資助也直接影響到子女日後對自己的養老實踐<sup>20</sup>。

這種複雜纏混的父母—子女親密共生模式也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一些傳統家庭和父權觀念，使得這種家庭模式兼具傳統和現代的特性。比如核心家庭雖然佔主體地位，但父母和成年已婚子女同住也非常普遍，而住在「一碗湯」距離之內的情況也比比皆是。祖父母協助育兒，甚至佔據育兒主導地位的現象普遍存在，直接挑戰了西方主流文獻中家庭現代化理論所主張的在現代化進程中，各國家庭均向「西方核心家庭模式」轉化和趨同的論斷<sup>21</sup>。再比如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期待兒子為父母養老，但是很多研究發現，女兒在養老方面的地位和責任不斷提升，處於與兒子相似的地位<sup>22</sup>。更有研究發現，女兒從父母處得到的少，但是付出的卻不比兒子少<sup>23</sup>。也就是說，女兒養老模式既突破傳統兒子養老模式而呈現出現代性的一面，也體現了傳統意義上對於女性進行照料和情感勞動的性別刻板印象和性別期待。性別、家庭行為和觀念在持續地突破傳統，擁抱現代化，但是這種蜿蜒突圍卻又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傳統的色彩和氣息。

在父母—子女的代際關係變得更為親密和相互依賴的同時，夫妻的代際關係也不再僅遵循傳統父權家庭的單方面父系延續，而是同時和父系與母系雙系家庭——也就是夫妻雙方父母的家庭——保持密切互動和相互依賴。實證研究表明這種雙系家庭實踐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體現，比如浪漫關係、同居、婚姻締結和結束、生育、居住安排、姓氏傳承、家產繼承、家庭實踐和規範的變遷，等等<sup>24</sup>。

有鑒於轉型時期以來中國家庭關係諸方面的變化，筆者在「馬賽克家庭主義」理論基礎上，融合本文的實證發現，概括提煉出「馬賽克家庭主義」理論的五個要點，用以解釋轉型時期的中國家庭模式（圖1）：

第一，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傳統和現代並存（衝突、協商、牽手、創新）。而這種傳統與現代雜糅的馬賽克特性，既是中國家庭制度轉型的背景，也是其變化的宏觀社會動力機制。

第二，當父系家長一支獨大的傳統父權大家庭逐漸式微，當代中國家庭向西方個體主義導向的核心家庭和多元家庭模式轉化的趨勢並不特別顯著，而在夫妻家庭中，代際親密共生的雙系多核家庭模式漸趨形成——父母子女相互依賴，夫妻關係、雙系代際關係兼重，性別維度明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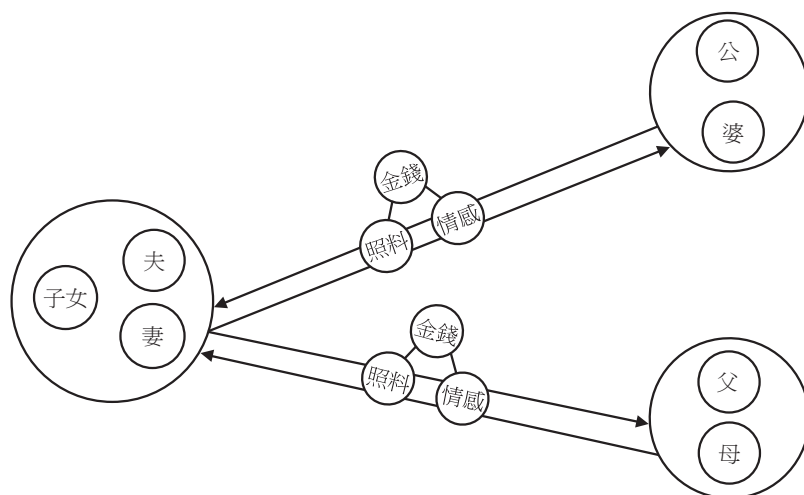
第三，在代際親密共生模式中，金錢、情感、照料和期待、義務、責任錯綜糾纏。

第四，不同代際的女性在無酬家務勞動和照料中承擔主要角色，是推動代際親密共生、雙系多核家庭模式形成的微觀動力機制。

第五，傳統、現代的家庭和性別規範在實踐中進行複雜和創新的互動，在微觀生活實踐層面、文化層面與宏觀結構層面的複雜現代性相互影響、互為構成。

這裏有必要提及的是，本研究聚焦於圍繞夫妻家庭為核心的雙系家庭模式——育兒養老的雙系代際循環模式，只是馬賽克家庭模式的一種。正是

圖1 雙系多核、代際親密共生的馬賽克家庭模式



說明：本圖以雙方老人健在，擁有一個或者兩個子女的夫妻家庭（即「四二一」、「四二二」家庭）為例，描述了這種雙系多核、代際親密共生，金錢、情感、照料密切互動的馬賽克家庭模式。

馬賽克家庭模式的傳統與現代雜糅的內核，使得這個大的理論框架也有闡釋目前並非主流的家庭（比如單親家庭、同居家庭、同性戀家庭等）的空間，但是這些均不是本文的關注。以下簡單介紹研究地點、樣本和研究方法。

### 三 樣本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定性研究的半結構性訪談和參與式觀察。研究地點為H市，位於發達的長三角地區，距離上海大約一小時車程。H市是一個人口約為九十萬的縣級市，由於快速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該市的農村和城市地區高度融合。居民的收入主要來自於工資性或者其他經營性收入；農村居民的收入主要不是來源於種地，種地主要提供的是日常的食物、蔬菜等。該地區長期執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低生育率和快速老齡化並存，對於該市很多獨生女家庭來說，女兒養老已經成為常態。

我們的樣本包括二十一名女性，主要通過熟人、親友介紹和「滾雪球」的方法招募而來；其中六人為1960年代出生，七人為1970年出生，還有八人為1980、90年代出生。我們訪談不同世代的女性，是考慮到這些女性在社會轉型進程中經歷了不同的歷史時期，而在個人的生命歷程中也經歷不同的養老、育兒階段，從而面臨不同的個人困境和變遷中的社會規範。樣本中除一人未婚，其他女性均已婚已育。她們的教育程度從初中到大學本科不等。樣本包括了獨生女以及有姐妹和有兄弟的家庭（表1）。我們根據「馬賽克家庭主義」的理論框架來開展訪談和觀察，強調代際關係日常互動的主線，着眼於女兒養老的實踐和規範如何在日常生活互動中形成。所有訪談均在2018年3月至2019年1月之間進行，訪談基本上在受訪者的家中進行。為了保護受訪者的隱私，文中均使用化名。

表1 受訪者情況

化名	出生年代	教育	工作	居住安排	子女
如蘭	1960年代	初中	零工	自住	一女
文鳳		初中	零工	自住	一女
佳蓉		職高	辦廠	公婆/自住	一子
冬梅		初中	辦廠	公婆同住	一女
愛珠		高中	銷售	自住	一子
艷萍		初中	工廠員工	公婆臨住	一子
王慧	1970年代	小學	家庭主婦	公婆臨住	一子
文華		初中	個體戶	自住	一子
明月		本科	教師	公婆/自住	一子
芬芳		小學	銀行後勤	公婆臨住	一女
永紅		初中	工廠員工	公婆/自住	一女
劉雯		大專	個體戶	父母同住	一女
木蘭	大專	個體戶	公婆同住	一子	
曉燕	1980年代	大專	企業員工	自住	一子
王穎		專升本	個體打工	公婆同住	一子
思雨		高中	個體打工	公婆同住	一子
麗蓉		本科	教師	公婆同住	一女
若彤	1990年代	本科	公司員工	公婆/父母	一女
茹楠		中專	護士	公婆/父母	一女
怡遠		職高	全職主婦	公婆/父母	一子
安琪		本科	公司員工	父母同住	無

## 四 研究發現

根據研究發現，我們集中描述「馬賽克家庭主義」所闡述的具有性別維度、父母子女相互依賴、雙系多核、兼具傳統和現代元素的代際親密共生的家庭模式及其運行機制。

### (一) 代際親密共生

下面主要從父母對子女的投入、情感依賴、養老期待，以及子女對父母的養老責任和實踐四個方面來敘述代際親密共生的家庭模式。

#### 1、父母對子女的資助投入

父母對子女的投入是巨大的，還經常延續到子女成年以後（包括結婚和有了自己的小孩以後），持續為他們提供經濟、人力、照料方面的幫助。受訪者經常說到父母為子女無私奉獻，害怕給子女「添麻煩」，「不願成為子女的負

擔」，「不圖子女的回報」，只是把子女作為自己的「感情寄託」。在佳蓉和冬梅的敘述裏，老年父母無怨無悔、任勞任怨，直到不能勞作為止的形象躍然紙上。佳蓉和冬梅都是1960年代出生，本身既是女兒也是媳婦，子女均已成人。佳蓉說：

跟風氣有關吧，我們H這邊的父母，甚麼東西都為子女着想。……只要有點錢，子女沒有房子，要買房子，就把錢積累，餘在那邊。……甚麼都幫子女想到了。還有幫子女做家務，吃飯都不用自己花錢，都是老的自己賺錢買菜。……等我們到了60歲，我們就自己出去玩兒了。我們也不管了。

佳蓉顯然把自己列入了「想得開」的父母類型，但是話音未落，她又說：「所以我們也會跟他〔兒子〕講，讓他趕緊，把對象找了，把孩子生了，趁我們現在還年輕。」

根據冬梅的回憶，父親在患癌症的時候，還頂着烈日出去掙錢。而看病的錢也是能省就省：

就是他自己看病的時候，他拿着自己賺的錢看的病。……比方說哪個藥能報銷，哪個藥不能報銷，不能報銷的那個藥他都不用。他的那個錢都算着用。然後〔孩子的〕外公去世之後，把那些事情都處理完了，打理完了，還多了四五萬塊錢，都是我姐姐保管的。這錢以後就是給我媽媽用的。

很多女性在訪談中回憶起成長過程中父母對於自己的巨大投入，對此充滿了感激。曉燕小時候家境不是很好，她父親一個人掙錢，養活她的母親和她兄妹倆。她用「砸鍋賣鐵」來形容父母親對自己和哥哥的教育投入，「他能給你提供的東西，他都提供給你了」。劉雯是一個自稱「啃老族」的媽媽，根據她的估算，父母親在經濟上把90%的收入投放在她和她的孩子身上，並無微不至地照顧她們的日常生活起居。

父母把大量的時間、金錢投入在子女身上，這種投入似乎沒有在孩子成年時終止，而持續到孩子結婚、生子。很多老人退而不休，開始了人生的「第二班」，由為子女服務延續到為自己的孫輩提供照料服務，甚至有些老人一直付出到自己「躺在牀上不能動了」。正是他們人生的「第二班」，大大減輕了年輕母親工作回來之後一天中的「第二班」<sup>②</sup>。在市場經濟時代，經濟風險和未來的不確定性不斷上升，父母在子女成長時進行密集的金錢、時間投入，在子女結婚、購房時給予大力資助，生兒育女時提供照料幫助。對於單位制式微後，住房、醫療、教育、照料等社會再生產責任的市場化帶來的巨大衝擊，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一定的緩衝作用，形成了一個家庭內部小循環的安全網絡——包括經濟活動、社會福利救助和照料等社會再生產活動，以事實上的私人家庭代際福利來補充、替代當前市場經濟體制下薄弱的社會福利體系。

## 2、父母對子女的情感依賴

在我們的樣本中，很多女性講述到父母對自己的情感依賴，講述當年自己結婚時父母不希望自己嫁得太遠，而一些身為母親的女性也流露出對自己孩子深深的眷戀和依賴之情。

「90後」的怡遠明顯地感受到，也深深理解母親對自己的情感依賴：

我媽媽那個時候，我還沒有結婚的時候，她對我的要求就是，不准嫁得太遠，以後要是有個病甚麼的，還沒有回來，人就不在了。

像我外婆，她生的孩子比較多……對我媽媽就沒有那種強烈的依賴。我媽媽就生了我這一個，她就覺得，她希望我們多住在這邊，多住幾天，多陪陪他們。

劉雯是「70後」，離婚後又再婚，之後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她說：「我覺得我一直是在陪伴他們。他們應該很不孤單。他們應該對這種狀態感覺蠻好的。」而對於女兒，則希望以後她不要嫁得太遠，因為自己暈車，不方便去看望她，「恨不得她每天都給我打電話」。劉雯說：

就像有一些老人覺得孩子怎麼怎麼樣的有本事：我的孩子在上海啊，在北京啊，怎麼怎麼樣的。我一點都不羨慕，還是希望孩子能夠在身邊。……有甚麼意思呢，去那麼遠的地方。……反正我是不太希望女兒將來找個對象多遠多遠。不能太遠！那你如果找一個遠方的，然後兩個人在家，生氣打架，我們又不會知道呀。孩子一個人在外面會苦死的。

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單位體制中，個人高度鑲嵌和依賴於單位這樣一個工作—生活—精神共同體，而在單位制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這種生活共同體和集體生活的感情歸屬都漸漸瓦解、消融，個人的情感、精神導向無處安放，轉而向家庭內部投射。由於獨生子女政策的長期執行和密集母職的興起和實踐，小家庭內部產生了非常親密的關係，父母對子女的情感依賴和期望可能也隨之更為強烈，給子女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壓力。而由於父母對子女的密集投入和情感依賴，因此也可能會對子女的生活比如戀愛、結婚、生育、夫妻關係等有所控制和介入。

## 3、父母的養老焦慮和養老期待

根據受訪者的敘述，在父母全心全意為子女付出的同時，他們也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想到自己的養老問題並有所行動。有人希望子女養老成為兩代人的一個默契，有人以行動為子女樹立榜樣，也有人積極給子女灌輸自己的意願。

永紅是「70後」，她的公婆並沒有明確和她講以後養老的事情。在永紅的分析中，一方面公婆害怕明說會引起子女的反感，另一方面他們則比較消極地希望社會規範和子女的責任感與孝心可以自發地起作用。她這樣猜測老人的心理：



他肯定想着，到時候躺牀上，我也不愁你們不問。你們不問的話，人家外面的人會指責你們。……我現在能動能做的時候我就做，不能弄的時候隨你怎麼弄。你不把我送到醫院裏面去，你自己下面也有孩子，是吧？……最起碼這個社會輿論壓迫你。

永紅也經常和自己十八歲的女兒開玩笑：「我不也經常跟我女兒說，以後如果你不管我的話，我就去穿得破破爛爛的，去丟你的架子。」

麗蓉的父母、公婆和永紅的公婆正好相反。儘管麗蓉的父母有兩個女兒，公婆有兩個兒子，但雙方的老人都流露出很強的養老焦慮。據麗蓉描述，「我媽這個人非常沒有安全感，生怕你以後不養她，一直說個不停」。她用「很緊張」一詞講述她媽媽暗暗給自己存下養老錢，卻又害怕女兒知道自己有多少錢。

「90後」獨生女安琪的父母的眼光就更為長遠。據她估計，父母每年收入中大概40%投入在她的教育上，他們也明確表示以後要靠她養老：「還是希望我能出人頭地。就是工作以後，就是能給他們後半輩子一定的經濟啊，或者各方面的支持。」「據我知道，我媽媽開始說將來要靠我，是從初一開始的，就開始給我灌輸這種觀念。小學的時候因為人比較小，沒有給我說將來要養他們啊甚麼的。」他們會說「快去工作，先把我在你身上花的錢，先掙回來」。

在單位制式微、市場經濟的風險性和不可預期性增強的情況下，生活成本和醫療成本快速增長，旨在覆蓋全社會的福利制度還相對薄弱，人們對於現實和未來的焦慮感持續加深，所以父母在投資於子女身上的同時，也希望將來自己可以老有所依，老有所養。而作為傳統父權家庭規範的養兒防老，伴隨着長期的低生育率特別是大量獨生子女家庭的存在，也漸漸過渡成為養兒/養女防老。

#### 4、子女的養老責任和實踐

當私人家庭成為市場經濟和「風險社會」的汪洋中的一條船的時候，受訪女性基本都認同孝敬父母和公婆，願意也往往正在踐行對父母、公婆的養老責任。這和當下社會上流傳的現在只有「啃老」、沒有「養老」的說法是不相符合的。事實上，年輕一代的養老負擔比較沉重，他們甚至通過孝敬和養老行為，為下一代樹立榜樣，隱晦地傳遞自己的養老期待，培育子女的養老責任。

麗蓉認為女兒養老和因計劃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獨生女家庭現象是密不可分的：「這批獨生女肯定都是義不容辭的。因為家裏面的好多資源，精力全部都分給了她，並沒有人來搶，是吧？所以養老這塊，她肯定是跟兒子一樣的。……1978年之前肯定不存在甚麼女兒養老的情況。」佳蓉則強調，「只有不是的子女，沒有不是的父母。反正到最後你要養他們的時候，你還是要養他們，該用錢的時候還是要用錢」，而且還要「做給小的看」。

在訪談中我們得知，很多女性都對公婆、父母有經濟資助。比如，冬梅的丈夫有兄弟兩人，根據她的回憶，公公住院時，冬梅家和冬梅丈夫的兄弟家平攤了20多萬塊錢。之前婆婆生病又花10萬多塊錢，也是兩家平分。即使在發達的沿海農村地區，這也是一筆很大的支出。永紅說父母生病的時候，自己會出錢又出力，「到時候錢嘛，肯定是要用的」，「服侍肯定是要去幫忙服

侍的」；「我覺得爸爸媽媽再不好，他就是對你一點幫助都沒有，你都不可以不養他們」。

女性和父母之間的金錢和照料支持是雙向的，存在於不同的生命歷程之中，其流向也往往與父母子女的財力和需要有關。在脫離單位集體的溫暖懷抱之後，家庭成為個人經濟的安全網和親密關係的生命線，受訪女性也深切地感受到父母對於自己的情感依賴和「示弱」。這些女性本身以及她們和配偶的關係，一定程度上都鑲嵌在和自己父母（甚至也包括公婆）的經濟、照料、情感互動之中；而老年父母也同樣鑲嵌在和成年子女以及自己的父母（如果還健在的話）的多維度密切互動之中。傳統家庭中的父權等級制度已經被父母和子女在經濟、情感和照料上相互依賴、相對趨於平等的親密共生、由代際網絡連接的家庭模式所代替。

## （二）中國式親密關係：金錢、情感和行動的交織

在西方語境裏，親密關係往往被定義在夫妻情侶之間的浪漫安全關係中，和個人主義、自我揭示性與表達性聯繫在一起<sup>26</sup>。本研究把親密關係置於代際關係之中，它和金錢關係緊密交織在日常生活實踐之中。這和社會學家齊立澤（Viviana A. Zelizer）的「購買親密關係」以及賈米森（Lynn Jamieson）的親密關係實踐的概念不謀而合<sup>27</sup>。而既有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成年子女的金錢支持對於老年父母心理健康具有正面作用<sup>28</sup>，以及金錢和代際關係、浪漫關係密不可分<sup>29</sup>。

### 1、行動證明一切

在中國社會崇尚「納於言而敏於行」的傳統裏，父母和成年子女直接地表達情感並不常見。但是從受訪者的敘述中，在她們成長的過程和日常生活中，父母子女血濃於水的深情表露無遺。

1960年代出生的艷萍回憶起在人民公社時期，平常只能吃山芋乾飯和蘿蔔飯，母親去集體做夜工，夜宵全部帶回來給孩子吃。永紅小時候家境不好，父親在外面打工養家。她滿懷感激地回憶，當年流行的確良面料連成年人都捨不得使用，而她的父母卻去為孩子訂做的確良衣服，令裁縫師傅大為驚訝。

曉燕回憶起以前住在省會城市時，有一次要出差，六歲的兒子沒有人照顧。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她想到了媽媽，給她打了「求救電話」，「因為也只有這個求救電話了」：「我這邊的孩子，沒有人帶了，然後我就會打一個求救電話〔給媽媽〕。然後我就會說，最近孩子沒有人帶呀。……然後她會說你不要着急啊。說女兒忙不過來，最後還有我們呀。」

如蘭經常去照顧自己生病的母親，她這樣描述母女間的互動：「幫她洗澡啊，買東西帶過去，給他們吃啊。帶水果的話就是給他們削好了吃。如果有菜，就幫忙做好了。反正就是那種很好的關係，有甚麼事情就幫忙幹甚麼事情。然後到了換季的時候，買衣服帶過去啊。」

在我們的樣本中，很多女性每周都去看望父母，甚至還有一個女性是天天去看望不同住的母親。她們經常會帶些蔬菜食材，和父母一起吃飯、做家

務等等。在這些女性成長的過程中，父母無私付出，在她們成年以後，日常生活中和父母持續互動，提供幫助和照料，由此體現、定義和組成了親密關係，而親密關係也在日常生活瑣碎、常規的實踐中汲取營養，不斷滋長。

## 2、「你給點錢他，他感覺到你關心他」

受訪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和父母有着經常性的金錢、食品和其他實用物品的交換，而這些錢物往來往往具有承載親密關係的象徵意義。愛珠表示父母衣服很多，不需要她買，但她「偶爾去買點衣服，讓他們高興高興」。冬梅曾經有一段時間和丈夫在上海打工掙錢，沒有時間照顧自己的父母。為此，她深感愧疚。金錢於是成了她表達歉意和愛心的一種方式，會讓老人「開心」、「知足」：

因為我就感覺我在上海那些年，我就感覺，我很愧疚的。照顧不到他們，過節也不能給他們買東西，感覺愧疚。就給他們錢，叫他們買點吃的，是吧？因為老人年紀大了，做子女的就應該伺候他。你說是吧？過節的時候該給他們買點東西孝順，就應該買。

時候也不算多，給個千把塊錢，〔孩子的〕外公就開心得不得了。外公心不大，他只要你關心他，他不關心錢給了多少。只要你給點錢他，他感覺到你關心他，孝順他。

在家人的互動中，金錢經常用來表達感情，表達「心意」，也經常用來救急。而這種救急體現了在血濃於水的親密關係中，普通人可以無條件、無時無地依靠家人的幫助。思雨講述自己從前在外地工作，生病時得到父親的幫助。她回憶父親沒怎麼說，就直接匯給她一萬多塊錢：「我有一年開刀。嗯，當時是在外面嘛，然後身上的錢不夠，然後我爸爸就是直接打錢給我的。我爸爸當時沒有問我〔錢夠不夠〕，我就提了一下在醫院裏，他說是不是錢不夠，屁股一轉，就打錢給我了。」那種父親疼愛、關心女兒的親密關係，在給錢這個行動中得到了高度的濃縮。劉雯的經濟狀況不太好，主要靠父母的幫助，父母非常心疼她，不希望她多花錢。她說，有時候從有限的收入裏拿錢去買衣服給父母親，「他們還不一定會很高興」。這是父母心疼女兒賺錢不容易，幫助女兒節省的意思。

父母子女的親密關係是在子女成長過程中以及日常生活互動中發展起來的，從上述例子可見，他們用行動和金錢來表達對彼此的關心和情感。特別是在緊急和需要幫助的時候，無論是經濟資助還是照料提供，此時更是無聲勝有聲。比如思雨的父親沒有問她需要多少錢，因為一問就顯得不夠親密了；又如曉燕說只有媽媽這一個求救電話可以打。這種通過金錢和行動所體現出來的親密關係，和西方語境裏的表達性情感，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說的強調自我揭示和溝通表述的純粹關係是非常不一樣的<sup>②</sup>。在轉型時期的家庭模式中，父母和子女有時候就住在一個屋檐下，有時候是「一碗湯」的遠近，有時候是一個電話/微信的距離。而這種點點滴滴瑣碎的日常行動和頻繁的經濟往來，使得他們的親密關係真正扎根於生活，建立在堅實的經濟基礎上，因為世俗、因為物質，反而真實可期、牢不可破。

### (三) 雙系多核家庭

這個部分主要描述雙系多核家庭模式的生活實踐，分別討論雙系並重的出現，以及父系家庭實踐和母系家庭實踐的相對興衰起伏，展示年輕一代夫妻的家庭如何鑲嵌在與雙方父母家庭的金錢、情感和照料互動之中。

#### 1、雙系並重

從訪談中可知，女性希望在供養自己的父母和公婆方面做到一視同仁；而上了年紀的母親，則希望可以有機會照顧女兒的生育、幫助她們照顧孩子，或者至少能和女兒的婆家一起來照料。養老的雙系並重似乎也與雙系老人對於子女的育兒幫助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獨生女安琪非常清楚自己以後的養老責任，「像之前女兒嫁出去就是潑出去的水，現在的話，情況已經嚴格改觀了。基於現在的生育情況，很多家庭裏面都是只有一個獨生女，女兒同時負擔了兩個家庭，就是贍養老人的義務」；「我覺得〔給雙方父母養老〕應該是一個同等的地位吧」。思雨和婆婆的關係不錯，與很多女性一樣，她表示在對丈夫和自己的父母養老方面要「一視同仁」，「一碗水端平」：

因為不能把話留給別人說啊，對吧？你不可能說只對你自己的爹媽好，不對公公婆婆好呀。那不然的話，別人不得罵你啊？所以說，不管我跟她聊得來，還是聊不來，她是我婆婆，那她還是我婆婆。

我感覺這個東西〔區別對待〕對於我而言不存在，因為……這個東西對於我而言一樣的。你要是生病了，我該怎麼照顧的還是怎麼照顧。你想吃甚麼東西是去買還是做，都是一樣的。

當養老慢慢變成雙系行為，育兒照料也變成了雙系實踐。女性對夫妻雙方父母的養老行為往往與他們幫助自己進行育兒照料是分不開的。而這種由於低生育率、獨生子女家庭比較普遍、代際的重心從「尊老」滑向了「愛幼」的現象，被安琪一語道破：「就主要還是因為孩子少，沒有選擇性。你說舅舅跟舅媽就哥哥這一個孩子，也就這一個兒媳婦，然後就一定要處好關係。一種新現象。」

樣本中所有的女性均沿着雙系方向遵循孝順規範或者作出養老實踐，這和傳統父權家庭中已婚女性跟隨丈夫給公婆養老，而不給自己父母養老的傳統規範和實踐是迥然不同的。這種雙系實踐的出現以及形成中的雙系規範，是對傳統父權家庭制度的一個革命性衝擊。

同時，子女的養老往往和夫妻雙方父母幫助育兒緊密聯繫。一方面，隨著女性經濟地位日益獨立，年輕一代女性能夠自己決定如何為夫妻雙方父母的養老提供人力、財力，盡量實現雙邊平衡。另一方面，雙方的父母因為各種原因，比如親密關係、養老等方面的需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在金錢、照料等方面給成年子女提供幫助，甚至爭奪自己孩子的注意和關心。特別是在雙方家庭均只有一個孩子的情況下，老年父母這種競爭議價的餘地也大大減少了。

在低生育率、密集母職和女性經濟地位相對獨立的情境下，代際關係權力重心轉移，雙方父母之間為了子輩進行博弈，養老和育兒緊密聯繫，相互促進，但也可能出現相互制約和衝突的局面。這就是子代家庭和雙方父母家庭互聯互動的雙系多核家庭模式發展、維繫的動力所在。

## 2、父系家庭規範的弱化

在雙系養老得到普遍認可和實行的同時，父系家庭規範也就出現了顯著的鬆動。雖然幾乎所有受訪女性都同意或者表示要為公婆養老盡孝，但是當她們講到媳婦不願意給公婆養老的現象時，則表示這要看「媳婦是否孝順」，也理解很多情況是因為「年輕的時候結了仇」，婆婆在媳婦生育和育兒方面「該照顧的時候沒有照顧」而造成的。

比如我們上面講到的思雨和婆婆關係不錯，她表示對婆婆要像對父母一樣養老，「盡量都一樣」。由於她的公公外遇，常年不住在家中，所以提到公公時，她顯得不屑一顧，否定了將來要為他養老。雖然婆婆一心為思雨家操持家務和帶孩子，但當訪談者問到如果婆婆沒有幫助帶孩子，是否養老會打折扣的假設性問題時，思雨不假思索地做了肯定的回答。她還認為婆婆一心一意照顧孫子，也有為自己養老的考慮。

麗蓉講述了公婆不幫助媳婦照顧孩子，因而媳婦也不願意對公婆負起養老責任的現象：「會有好多人家，因為鬧矛盾，不願意照顧公公婆婆，你兒子自己去照顧。尤其在生孩子這一塊，傷了媳婦心的，都說該照顧的時候沒有照顧，沒有幫她帶孩子，沒有服侍她坐月子。有的人到最後也不養老了，就是，我只出錢。」

麗蓉這樣分析女性和雙方父母特別是婆婆的關係：

如果說兒媳婦懂事的話，這邊是媽媽，那邊也是媽媽，男方的那邊也是媽媽，就一視同仁的對待。如果是不懂事的話，你就會覺得，反正男方家的媽媽不是很好。但是現在做婆婆的話也要講理，做婆婆難做嘛。做婆婆如果是對兒媳婦當女兒一樣，還好。但是如果這個做婆婆的強勢得很，媳婦也是不買賬的。

也就是說，公婆的養老要依賴於媳婦是否孝順、「懂事」，而媳婦的「懂事」，也和公婆是不是「講理」，是否服侍媳婦坐月子、幫助帶孩子有關，甚至在婆婆「不是很好」、「強勢得很」的情況下，媳婦還可以「不買賬」。和傳統父權家庭不一樣的是，現在「做婆婆難做嘛」，「也要講理」，並且婆婆幫助媳婦帶孩子，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了「該照顧」、理所當然的事，是普通家庭合乎情理的期待。

在父系權威已經顯著下降的情況下，養兒防老、孝敬公婆的傳統父權家庭規範的底線還在一定程度地被遵守着，但是如何養老、養老的質量如何、是否盡心，已經是一個可以商討的實踐問題，甚至這個底線的根基也並非牢不可破。比如前述思雨的公公觸犯了一夫一妻制中夫妻忠誠的底線，可謂「為老不尊」，也沒有給思雨提供過任何幫助，所以最終失去了思雨給他養老的資格。

### 3、母系家庭實踐的強化

在父系家庭規範削弱的同時，母系家庭在已婚女性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大大增強。同樣以思雨為例，她說過要在養老方面對婆婆和自己爸媽一樣對待，但是她所謂的一樣對待主要是指行為上；而在情感上，思雨明顯偏向自己的父母：「情感上面就別提了，哈哈。這個東西我不敢保證」，「所以這個東西，噓寒問暖肯定是不存在的，噓寒問暖可能只會針對我爸媽」。她還說「人心都是偏的」，而這種想法和很多受訪女性的敘述一致。

思雨還提及一次婆婆生病住院，雖然她對於婆婆也是「煮好飯去餵的，一勺一勺餵的，吹冷了餵的」，但還是和照料自己的父母不一樣：

我可能說照應婆婆的時候，除了幫她看水〔吊針〕，我自己就會在那裏玩手機啊甚麼的。那可能在照應我爸爸媽媽的時候，就可能是找點話題跟他們聊聊，談談家常甚麼的。因為怎麼說呢，你跟沒有話題的人在一起，你能怎麼聊？我聊不下去。

茹楠也說，如果婆婆和媽媽同時生病，她會把她們接到一起來照顧，但是「心機不一樣」，對媽媽是「真正的關心」，對婆婆則還有一個考慮，就是害怕她倒下去，沒有人照顧孩子了。

麗蓉則從現代婚姻的脆弱性來強調自己父母的重要性。用她的話來說，公婆只是夫妻愛情的「附帶品」，如果婚姻沒有了，「它也會消失」，而父母才是自己的「底線」。她認為父母或公婆病了，「都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上是一樣的」，但是「緊張度不一樣」，「還是擔心自己的爸爸媽媽」：

如果說地位，肯定是我爸媽重要呀。如果離婚了，我肯定不認公婆呀。我爸爸媽媽肯定要認呀，假設離婚他們也認我的。對吧？是的，這個不可以等同的，永遠不可以等同的。

這個會的，所有的女兒都會把自己的底線留給爸爸媽媽，不會給公公婆婆。就是，而且你也不能把底線留給公公婆婆。

無論你們之前關係多好，一離婚關係立馬翻臉！立馬！哪怕他的兒子是個人渣，他們都會站在他兒子那邊。

中國女性獲得經濟獨立的同時，在法律上也擁有自行決定結婚和離婚的權利。中國社會正處在人口和經濟轉型之中，從一個接近普遍婚姻和相對早婚的社會，向晚婚和不婚的社會轉變，與此同時，離婚率快速上升。現代婚姻制度的這種轉型，本身就是對父權體系的削弱，同時也使得父母子女的代際關係變得尤為重要。婚姻的脆弱性一定程度上反而促進了代際關係的重要性。這和西方社會由於離婚率上升，代際關係重要性得以突顯的趨勢是一致的<sup>⑩</sup>。

女性的經濟地位，一方面出於自己的努力和天賦才能，另一方面也和父母從小對自己的密集投資培養和成年之後持續的經濟、照料支持有莫大關係。也就是說，女性與她的配偶在小家庭中的關係，鑲嵌在她與父系家庭中

公婆的關係，以及她與母系家庭中父母的關係之中。雖然雙系的父母和公婆都可能給女性提供幫助（或者增加負擔），但是父母卻是女性堅強可靠的後盾，這是公婆難以比擬和替代的。在這些女性的敘述中，親密關係的維度和界線漸漸修正了傳統父權、父系規範，父母是夫妻情感的「底線」，而公婆則是可能會消失的「附帶品」。

在雙系多核的家庭模式中，傳統父權家庭中金錢和照料的流向更多地從父輩向子輩傾斜，情感和權力的天平也慢慢從父系向母系漂移。在規範和實踐層面上，父系地位下降、母系地位上升，雙系多核家庭的出現，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在這個過程中，傳統父權家庭的等級關係漸漸削弱，被一種更為平等、親密的關係所代替，但是這種親密關係又不是純粹的情感關係，它和金錢、照料實踐互相交織，密不可分。

#### （四）現代性別實踐和傳統父權規範的探戈

這個部分主要描述雙系多核家庭體系的性別模式，展示了性別規範如何和傳統父權家庭規範交叉互動，而傳統規範演變成現代實踐的同時，其強韌的生命力也得以微妙重申。

##### 1、養老實踐

在養老的問題上，很多受訪者認為現在兒子和女兒一樣，都有養老的責任，但是她們同時也承認在實際的分工中，兒子、女兒、媳婦往往有所不同，與之相關的是，父母對於家產的分配也是男女有別的。這種養老照料的性別規範和修正後的父權家庭規範緊密相連，交叉嚙合。

對於獨生女家庭的女性來說，父母對她們的集中投入和財產轉移，也提高了母系在年輕夫妻家庭中的地位，特別是在財產繼承上強化了女性對於母系的養老責任和能力。比如文鳳就表示，「不管我手上有多少東西，都是留給我女兒，都不會給其他人的」。所以在獨生女或者多女無子家庭，對女兒的養老期待和其他家庭對兒子的養老期待其實是一樣的，就如麗蓉所說：「當然了，我們到了甚麼年代了，女兒就是跟兒子一樣的。」

我們的訪談表明，在養老實踐中，無論是只有女兒的人家，還是有兒有女的家庭，女兒已經成了「主力軍」。如果女性本身還是媳婦的話，同時還要承擔着公婆的養老責任。但是這種新的性別實踐要成為新的規範，尚在形成之中。比如在有兒有女的家庭中，女兒的養老實踐往往不被完全承認，被認為只是提供了一些照料，是憑良心，或者是靠感情、靠奉獻，最後父母過世，女兒也不一定能繼承遺產或者公平繼承遺產。受父系家庭傳統的影響，兒子往往擁有繼承權，女兒多半也並不提出異議，受訪者表示不在乎那點錢，家庭關係和睦與父母開心更重要。麗蓉以她的嫂子為例，說明農村養老「兒子出錢，姑娘出力」的做法，講到嫂子的父母把「所有的錢，不管是錢還是精力，全部付給了兒子」，但是嫂子也「不覺得吃虧，就是已經被洗腦了」。

而在女兒和媳婦承擔照料老人責任的同時，她們之間似乎還有一道微妙的父權、父系家庭傳統的界線，即女兒往往會提供更私人、可能也更髒更累

的照料。比如艷萍的母親住院時，她的兄弟出錢，煮飯送飯由兄弟的家庭負擔，她則專門在醫院服侍護理，擦洗身體等。而冬梅母親住院的時候，嫂子做飯，嫂子和冬梅姐姐輪流送飯，衣服則由姐姐去洗。在照料父母的過程中，女兒還提供了更多的情感勞動，如前文提到思雨的「噓寒問暖」和茹楠「真正的關心」。

總而言之，在養老方面存在着明顯的性別分工，女性很大程度上承擔了照料工作。實證研究發現，和兒子相比，媳婦和女兒的照料對於父母的抑鬱有很好的改善作用<sup>②</sup>，女兒也比兒子為父母提供了更多的情感支持<sup>③</sup>。但是相對於男性而言，女性的養老實踐一定程度上被低估，在財產繼承上也不一定能得到公平的對待。進一步說，在女兒和媳婦之間，女兒往往承擔了更私密的護理和更多的情感勞動，體現了性別規範和父權規範在私人親密關係領域的微妙試探和劃界。而在只有女兒的家庭、特別是獨生女家庭，女兒的養老責任和繼承同兒子相比就似乎沒有甚麼差異了。有些受訪者還表現出對女兒的偏愛，認為女兒對父母更貼心，會提供更多的照料，如麗蓉說，「所以說生兒子的人家還是挺悲哀的」。這種新的性別實踐，一方面對傳統父權家庭規範發起了強烈的挑戰，另一方面又把照料父母固化成女性的責任，反過來又強化了父權規範。

## 2、養老和育兒的照料循環

女性的養老實踐，是和女性的育兒實踐，特別是父母和公婆對於女性育兒實踐的幫助密不可分。如前所述，很多時候媳婦是否願意為婆婆養老，與婆婆是否在自己生育和育兒階段提供了幫助有關。這也是為甚麼在進行養老訪談的時候，受訪女性總是不斷地講述育兒照料情況。

思雨的闡述很好地說明了育兒變成了不同代際女性的職責，而父系實踐漸漸向母系實踐轉移。在這裏，照料的性別規範在娘家和婆家的邊界之間游移，並和傳統的父權家庭規範出現了交叉：

現在大城市都是婆婆帶孩子，你知道嗎？婆婆帶孩子，因為有了孩子之後，就會產生很多矛盾，肯定是跟自己的父母更容易解決。其實，男的他在家庭裏面的角色，很多時候是游離的，你懂嗎？他不會參與到。……所以更多的是女人在處理這些事情。所以說，你是願意跟父母處理這些事情？還是跟公婆處理？

育兒照料體現出一種明顯的性別角色期待，成為不同代際和雙系女性的責任——無論是已婚女性本人，還是她的婆婆或者母親。這和傳統父權家庭規範要求媳婦給公婆養老的代際方向相反，即婆婆也被期待幫助媳婦帶孩子，體現了傳統父權的衰退和子代地位的上升。進一步說，這種沿着父系家庭邊界的育兒實踐開始擴展到母系家庭，已婚女性的母親也開始參與這種照料活動<sup>④</sup>。但是，父系和母系支持之間有一條若隱若現的界線：婆婆的參與往往被認為是「該照顧的」，在父系傳承的邊界之內；而母親的參與既非義務、



亦非傳統社會期待，而是已婚女性在情感上更希望的照料安排，如艷萍所說，因為「她跟自己的媽媽知己一點」。

由於母親逐漸參與女兒孩子的養育，為女兒提供了婆婆以外的育兒支持，使得婆婆不再是單一的照料提供方，女兒也有了選擇的餘地，娘家的地位開始提高，而婆家的地位相對下降。在這種情境下，祖輩的育兒照料既是責任也是權利，更是對權力和未來養老的潛在投資。在這個動搖父權家庭傳統的連鎖反應鏈條的過程中，如果公婆沒有參與媳婦的育兒實踐，就可能對自己以後的養老問題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

艷萍的內心掙扎進一步呼應了思雨的說法。艷萍既是女兒、媳婦，也是婆婆，和自己的兒子、媳婦、剛出生的孫子住在一起。由於她目前還在上班，因此親家母上門來照料她的媳婦和孫子。她對這種分工既感欣慰，也有些失落：

帶孩子也本來應該帶孩子的。……有孩子帶，當然也是比較有福氣的。但是有許多人沒有孩子帶的。你不想孩子？要吊着孩子。孩子都有了，升了一級呢。

他有的〔讓帶〕，還有的也不讓帶。有的人家的媳婦不讓婆婆帶，都認為自己的媽媽帶得比較好。她跟自己的媽媽知己一點。是這個意思，她不放心的婆婆帶的。有些話〔婆婆〕和她溝通，她不好直接說，她跟她媽媽可以直接說。

隨着生育率的降低、獨生子女一代的成長和對育兒期待的提高，以及女性的勞動力市場參與，育兒一定程度上成為女性、婆婆、母親的共同責任。在雙方均只有一個孩子的情況下，加上育兒照料和養老實踐的潛在聯繫，育兒可能成為雙系競爭的對象，而女兒在很多情況下都希望母親參與進來。造成的結果是，一方面，照料的責任落在不同代際的女性身上；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提高了她們在家庭中的權力地位和以後對養老的要價。不同代際和雙系的女性在養老和育兒照料中分工協作，完成社會再生產最重要的環節和循環。這種實踐也使得年輕一代夫妻的家庭和父系、母系的家庭聯繫緊密，夫妻關係和代際關係兼顧，雙系並重，多核共存，分工協作，依賴共生，從而抵禦市場的風險，給自己提供最大程度的安全和保障，並在重新書寫性別和家庭規範中不停探索邊界，在拓展中交錯，在試探中重疊。

養老和育兒照料的代際循環和雙系拓展，既強化了傳統性別角色期待，又削弱了傳統父權家庭規範，然而後者又在固化的性別實踐中得到了體現。一方面，在雙系實踐和性別規範有所強化的同時，父系權威和父權規範受到很大的挑戰和削弱；另一方面，父權規範的一些要素又以隱晦、微妙的方式得以重申甚至強化。比如很多女性提到「把女兒當做兒子養」，希望她像兒子一樣養老，但是卻沒有人指望兒子也能變成「小棉襖」，像女兒一樣發展更親密的關係和提供情感勞動與照料服務；又如在婆婆和母親競爭為女性提供育兒照料時，婆婆的幫助往往被視為應該的，符合父權家庭的期待。

## 五 討論和結論

綜上所述，在中國轉型社會複雜現代性的情境下，父母子女、夫妻之間在經濟上合作、分工，情感上相互依賴，精神上共同支持，形成了具有鮮明性別維度的代際親密共生、雙系多核互動的馬賽克家庭模式。和傳統家庭中顯著的代際等級森嚴、人際關係疏離不同，這種模式中家庭成員包括代際之間的關係更趨平等和親密。此外，馬賽克家庭模式中傳統與現代雜糅，色彩鮮明，如性別規範、照料和家產繼承方面，既體現了傳統的女性角色期待，也體現了現代社會進步的性別平等趨勢和女性地位的提高，而傳統父權家庭規範在頹勢凸顯的同時，也在頑強延續，甚至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在風險叢生和不確定性極高的市場經濟中，不同代際的女性通過養老、育兒實踐，通過金錢、情感和照料把她們各自的家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組成一個不同代際、雙系家庭的自助安全網和抵禦風浪的船隊。當中的夫妻關係和代際關係可能是同舟共濟，也可能會產生緊張衝突<sup>⑤</sup>。

本研究強調了馬賽克家庭模式對於個人的保護作用，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這種模式的脆弱性和潛在的難以持續性。在頻繁的互動中，代際衝突往往在所難免。特別是在當今中國社會人口和經濟雙雙轉型的關鍵時期，女性的家庭—工作矛盾日益尖銳，她們可能會面臨照顧子女、公婆和父母的三重負擔<sup>⑥</sup>。這種家庭模式在幫助女性分擔育兒責任的同時，也有可能出現育兒和養老之間，以及雙系父母養老之間的衝突，從而激化女性的家庭—工作衝突，有可能進一步導致生育率和女性勞動市場參與率雙雙走低，小則影響到個體家庭的財政境況，大則影響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總而言之，本研究是對於中國轉型社會正在初現端倪、未來有可能大規模出現的家庭模式的一個經驗考察和總結，以及初步的理論提煉和反思。我們必須意識到，長期計劃生育政策和未來還將持續走低的生育率是這種家庭模式出現的一個重要的人口政策和社會變遷的背景。就「馬賽克家庭主義」理論強調的傳統與現代雜糅性而言，中國社會未來的家庭模式應該包括這種代際親密共生、雙系多核家庭模式在內的各種更為傳統，或更為現代的模式，以及其他形態家庭模式的雜糅共存。這種圖景和論者對於所謂「正常家庭」模式和西方中心主義現代化的批判<sup>⑦</sup>，對於多種家庭模式、傳統和現代模式在世界範圍內並存的描述是一致的。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定量研究可以受到這個理論的啟發，去發展更多扎根於本土情境的假設，去發現更多地域甚至全國範圍的種種家庭關係和模式。

### 註釋

① 蘇劍、康健：〈人口負債與中國經濟增長〉；楊菊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挑戰與對策思考〉，《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9年8月號，頁4-5、10-11、23-27；計迎春：〈社會轉型情境下的中國本土家庭理論構建初探〉，《婦女研究論叢》，2019年第5期，頁9-20。

- ② Yunxiang Yan,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Oxford: Berg, 2009), chap. 3, 5; Yingchun Ji and Wei-Jun Jean Yeung, "Heterogene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riag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5, no. 12 (2014): 1676-82.
- ③ 蘇劍、康健：〈人口負債與中國經濟增長〉，頁 11-12。
- ④ Yunxiang Y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xxxi-xxxii.
- ⑤ 代表性研究參見 William J. Goode,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Dirk J. van de Kaa, "Europe'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Bulletin* 42, no. 1 (1987): 1-59;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trans. Mark Ritter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Ron Lesthaeghe, "The Unfolding Story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6, no. 2 (2010): 211-51; Arland Thornton, "The Developmental Paradigm, Reading History Sideways, and Family Change", *Demography* 38, no. 4 (2001): 449-65; *Reading History Sideways: The Fallacy and Enduring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al Paradigm on Family Lif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 ⑥ 參見 Yingchun Ji, "Asian Families at the Crossroads: A Meeting of East, West, Tradition, Modernity, and Gende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7, no. 5 (2015): 1031-38; Gavin W. Jones and Bina Gubhaju, "Factors Influencing Changes in Mean Age at First Marriage and Proportions Never Marrying in the Low-fertility Countr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5, no. 3 (2009): 237-65。
- ⑦ Feinian Chen, Susan E. Short, and Barbara Entwisle, "The Impact of Grandparental Proximity on Maternal Childcare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19, no. 6 (2000): 571-90; Feinian Chen, Guangya Liu, and Christine A. Mair, "Intergenerational Ties in Context: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 China", *Social Forces* 90, no. 2 (2011): 571-94；李婷等：〈中國家庭結構變遷：年齡、時期、隊列視角的觀察〉，手稿，2018年，未刊。
- ⑧ Feinian Chen, Guangya Liu, and Christine A. Mair, "Intergenerational Ties in Context", 571-94；石金群：〈轉型期家庭代際關係流變：機制、邏輯與張力〉，《社會學研究》，2016年第6期，頁 191-213。
- ⑨ 石金群：〈轉型期家庭代際關係流變〉，頁 191-213；Yunxiang Yan, "Intergenerational Intimacy and Descending Familism in Rural North Chin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18, no. 2 (2016): 244-57；吳小英：〈流動性：一個理解家庭的新框架〉、閻雲翔：〈社會自我主義：中國式親密關係——中國北方農村的代際親密關係與下行式家庭主義〉，《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7期，頁 88-96、4-15；Yingchun Ji, "A Mosaic Temporality: New Dynamics of the Gender and Marriage System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Temporalités*, no. 26 (2017): 1-16; Yunxiang Yan, "Neo-familism and the State in Contemporary China", *Urban Anthropology and Studies of Cultural Systems and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47, no. 3-4 (2018): 181-224。
- ⑩ Sarah Cook and Xiao-yuan Dong, "Harsh Choices: Chinese Women's Paid Work and Unpaid Care Responsibilities under Economic Reform",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2, no. 4 (2011): 947-65; Yingchun Ji, "Asian Families at the Crossroads", 1031-38; Shengwei Sun and Feinian Chen, "Reprivatized Womanhood: Changes in Mainstream Media's Framing of Urban Women's Issues in China, 1995-2012",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7, no. 5 (2015): 1091-1107; Yingchun Ji et al., "Unequal Care, Unequal Work: Toward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Post-reform Urban China”, *Sex Roles* 77, no. 11-12 (2017): 765-78.

① Francis L. K. Hsu,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Kinship,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Village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 費孝通：〈家庭結構變動中的老年贍養問題——再論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動〉，《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3期，頁7-16；林耀華：《金翼：中國家族制度的社會學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8）。

② 陳皆明：〈投資與贍養——關於城市居民代際交換的因果分析〉，《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6期，頁131-49；〈中國養老模式：傳統文化、家庭邊界和代際關係〉，載邊燕杰編：《關係社會學：理論與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380-97；郭于華：〈代際關係中的公平邏輯及其變遷——對河北農村養老事件的分析〉，《中國學術》，2001年第4期，221-54；賀雪峰：〈農村家庭代際關係的變動及其影響〉，《江海學刊》，2008年第4期，頁108-13；沈奕斐：《個體家庭iFamily：中國城市現代化進程中的個體、家庭與國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3）；狄金華、鄭丹丹：〈倫理淪喪抑或是倫理轉向：現代化視域下中國農村家庭資源的代際分配研究〉，《社會》，2016年第1期，頁186-212；石金群：〈轉型期家庭代際關係流變〉，頁191-213；Yunxiang Yan, “Intergenerational Intimacy and Descending Familism in Rural North China”, 244-57；吳小英：〈流動性〉，頁88-96；閻雲翔：〈社會自我主義〉，頁4-15；Yunxiang Yan, “Neofamilism and the State in Contemporary China”, 181-224。

③⑬ Yingchun Ji, “A Mosaic Temporality”, 1-16.

④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Chang Kyung-Sup, “Compressed 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 South Korean Society in Transi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28, no. 1 (1999): 30-55; Yunxiang Yan,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The Chinese Path to Individualiz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 no. 3 (2010): 489-512.

⑤ Yingchun Ji et al., “Unequal Care, Unequal Work”, 765-78.

⑦ 陶艷蘭：〈世上只有媽媽好：當代城市女性的母職認同與實踐〉，《婦女研究論叢》，2013年第6期，頁87-96；金一虹、楊笛：〈教育「拼媽」：「家長主義」的盛行與母職再造〉，《南京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頁61-67；陳蒙：〈城市中產階層女性的理想母職敘事——一項基於上海家庭的質性研究〉、楊可：〈母職的經紀人化——教育市場化背景下的母職變遷〉，《婦女研究論叢》，2018年第2期，頁55-66、79-90；金一虹：〈社會轉型中的中國工作母親〉，《學海》，2013年第2期，頁56-63。

⑧ 鍾曉慧、何式凝：〈協商式親密關係：獨生子女父母對家庭關係和孝道的期待〉，《開放時代》，2014年第1期，頁204-22。

⑨ 石金群：〈轉型期家庭代際關係流變〉，頁191-213；李婷等：〈中國家庭結構變遷〉。

⑩ 許琪：〈扶上馬再送一程：父母的幫助及其對子女贍養行為的影響〉，《社會》，2017年第2期，頁216-40；許若男：〈轉型期女兒養老研究〉，手稿，2018年，未刊。

⑪ Feinian Chen, Guangya Liu, and Christine A. Mair, “Intergenerational Ties in Context”, 571-94.

⑫ 唐燦、馬春華、石金群：〈女兒贍養的倫理與公平：浙東農村家庭代際關係的性別考察〉，《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6期，頁18-36。

⑬ Yu Xie and Haiyan Zhu, “Do Sons or Daughters Give More Money to Parents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1, no. 1 (2009): 174-86；許琪：〈兒子養老還是女兒養老？基於家庭內部的比較分析〉，《社會》，2015年第4期，頁199-219；Anning Hu, “Providing More but Receiving Less: Daughters in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in Mainland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9, no. 3 (2017): 739-57；許若男：〈轉型期女兒養老研究〉。

⑭ 金一虹：《父權的式微：江南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性別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王會、狄金華：〈「兩頭走」：雙獨子女婚後家庭居住的新模式〉，

《中國青年研究》，2011年第5期，頁9-12；黃亞慧：〈併家婚姻中女兒的身份與地位〉，《婦女研究論叢》，2013年第4期，頁109-14；魏程琳、劉燕舞：〈從招郎到「兩頭住」：招贅婚姻變遷研究〉，《南方人口》，2014年第1期，頁59-68；張靜：〈浙江桐鄉「併家婚姻」策略的人類學解讀〉，《廣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頁45-52；高萬芹：〈雙系並重下農村代際關係的演變與重構——基於農村「兩頭走」婚居習俗的調查〉，《中國青年研究》，2018年第2期，頁11-17；于嘉、謝宇：〈中國的第二次人口轉變〉，《人口研究》，2019年第5期，頁3-16；Yingchun Ji et al., "Young Women's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the Emerging Bilateral Family System under China's Two-child Family Planning Policy", *China Review* 20, no. 2 (2020): 113-41。

⑳ Arlie Hochschild and Anne Machung,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Familie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2).

㉑㉒ Anthony Gidde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㉓ Viviana A. Zelizer, "The Purchase of Intimacy", *Law & Social Inquiry* 25, no. 3 (2000): 817-48; Lynn Jamieson, "Intimacy Transformed? A Critical Look at the 'Pure Relationship'", *Sociology* 33, no. 3 (1999): 477-94; "Intimacy as a Concept: Explaining Social Chang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sation or Another form of Ethnocentricism?",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6, no. 4 (2011): 1-13.

㉔ Merril Silverstein, Zhen Cong, and Shuzhuo Li,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eople in Rural China: Consequences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1, no. 5 (2006): 256-66; Feinian Chen and Guangya Liu, "The Health Implications of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 China",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7, no. 1 (2011): 99-112; Feinian Chen et al., "Race/Ethnic Differentials in the Health Consequences of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for Grandparents",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70, no. 5 (2014): 793-803.

㉕ 肖索未：《欲望與尊嚴：轉型期中國的階層、性別與親密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鍾曉慧、何式凝：〈協商式親密關係〉，頁204-22。

㉖ Vern L. Bengtson, "Beyond the Nuclear Family: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Multigenerational Bonds: The Burgess Award Lectur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3, no. 1 (2001): 1-16.

㉗ Zhen Cong and Merril Silverstei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among Elders in Rural China: Do Daughters-in-law Matte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0, no. 3 (2008): 599-612.

㉘ Zhen Cong and Merril Silverstein,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Rural China: A Gendered Extended Family Perspective", *Ageing & Society* 32, no. 3 (2012): 425-50.

㉙ Cong Zhang et al., "The Rise of Maternal Grandmother Child Care in Urban Chinese Famil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1, no. 5 (2019): 1174-91.

㉚ 吳帆：〈代際衝突與融合：老年歧視群體差異性分析與政策思考〉，《廣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5期，頁218-26。

㉛ 計迎春、鄭真真：〈社會性別和發展視角下的中國低生育率〉，《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8期，頁143-61。

㉜ Judith Stacey, *Unhitched: Love, Marriage, and Family Values from West Hollywood to Western Chin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2).